

# 我的 中国 故事



海外汉学家  
视野里的中国

《我的中国故事》编委会 编

〔荷〕伊维德 等 著

# 我的 中国 故事



海外汉学家  
视野里的中国

《我的中国故事》编委会 编

〔荷〕伊维德 等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中国故事：海外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 / (荷)伊维德等著；

《我的中国故事》编委会编，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7

ISBN 978-7-5699-2497-8

I. ①我… II. ①伊… ②中… III. ①访华观感IV. ①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3438号

## 我的中国故事：海外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

WO DE ZHONGGUO GUSHI HAIWAI HANXUEJIA SHIYE LI DE ZHONGGUO

编 者 | 《我的中国故事》编委会

著 者 | (荷)伊维德 等

出 版 人 | 王训海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余荣才 葛江霞

装帧设计 | 谢金宝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6090480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20.75 字 数 | 300千字

版 次 |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497-8

定 价 |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我的中国故事》编委会

主 任：张纪臣

副主任：林丽颖

委 员：张纪臣 林丽颖 雷建华

赵大新 王宇燕

编 务：葛江霞 周 佳 邓南茜

于明子 辛炳烽

这本书收集了来自十四个国家的十五位汉学家的“我的中国故事”，这里面有五位是我熟悉和认识的，德国的高立希、罗马尼亚的白罗米、匈牙利的克拉拉、缅甸的杜光民、塞尔维亚的巴亚茨。

巴亚茨是不会讲中文的“汉学家”，这位作家兼出版商每年都来中国，我感觉如果房价不是太高的话，他会在北京或者青岛买下一套房子。我去过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地缘政治出版社，喝着土耳其咖啡的时候，他向我展示了已经翻译成塞尔维亚文出版的中国图书，还向我描述了他要出版更多中国图书的雄心勃勃计划，脸上洋溢着很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的表情。

这十五个“我的中国故事”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性别年龄，他们的研究、写作和翻译领域也是各不相同，从古代到当代，从文学到戏曲，从历史到政治等应有尽有。他们学习中文的经历和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因此五彩缤纷。这些五彩缤纷的故事有一个地方是一致的，就是共同讲述了对中国的爱和对中国巨大变化的惊叹。

关于爱和变化，我要在这里和你们分享自己的故事。爱在不少汉学家那里经常是通过失望和想念表现出来的。先说失望，经常有汉学家向我讲述他们国家里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无知，那时候他们的语气和表情充满了失望，需要我去安慰他们，我说这个仍然需要时间。我知道这些无知通常是由愚昧造成的，我刚去过里斯本，在那里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她是前年过来留学的，租了一间房子，葡萄牙房东指着家里的冰箱问她，你见过这个吗？再说想念，我在国外的時候，经常有汉学家向我表达对中国的想念，有几位说到动情处眼睛湿润。今年1月下旬，塞尔维亚的汉学家安娜陪我前往波黑的维舍格勒，路上她说太想念北京了，甚至想念北京

的雾霾，她希望自己明天就能够飞到北京，下了飞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狠狠吸一口北京的雾霾。我说今年冬天北京大风不止，雾霾被吹散驱走了，你下了飞机很可能吸不到雾霾。她说那我就狠狠吸一口北京的大风。

十天前的这个时候，我坐在里斯本的一家书店里，活动的主题是“变化、记忆和写作”，我从交易的角度讲述了中国变化的故事。我告诉葡萄牙的读者，中国人在吸收新的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任何障碍，适应的速度之快令人感觉到新旧之间似乎没有距离，比如移动支付，短短几年时间，阿里巴巴支付宝的 APP 和腾讯微信支付的 APP 差不多被装载进了所有的智能手机，从超市的收银台到办理证件的收费窗口，从大商场到街边小店，只要有交易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二维码放在显眼的位置，人们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扫一下就轻松完成交易。我自己在中国已有一年多没有用过现金，也没有用过信用卡，因为手机支付太方便了。有些人上街时口袋里没有现金也没有信用卡，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所有来自生活的需求。于是乞丐也与时俱进，他们身上挂上了二维码，乞求过路的人拿出手机扫一下，用移动支付的方式给他们几个零钱。

我告诉他们，也就是三十多年前，不少中国人出差时担心钱被偷就把现金藏在内裤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内裤的内侧缝上一个口袋，还会缝上纽扣，需要付钱时，手伸进去摸索一会儿，根据需要支付的金额，准确地摸出一张五角的或者一张一元的钞票来，因为钞票的大小不一样。女性都会去会找个隐蔽的地方悄悄摸钱；有的男性大大咧咧，会当着别人的面把手伸进内裤摸索，即使对面是一位或者几位女性也会这么做。这个动作要是在今天出现的话，很容易被指控为性骚扰。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编辑这部《我的中国故事：海外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重现了一千四百多年前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2018 年 6 月 16 日

# 目录

---

- 1 序 / 余华
- 
- 2 中国文学之旅 / 伊维德（荷兰）
- 24 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在翻译中国 / 李莎·卡尔杜齐（加拿大）
- 60 一位匈牙利文学译者的中国故事 / 克拉拉·宗博莉（匈牙利）
- 84 爱中国，也爱中国人 / 贝尔纳·布里赛（法国）
- 112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 达莎（白俄罗斯）
- 128 中国，半个世纪魂系梦萦 / 黑山（斯洛伐克共和国）
- 152 和中国有缘 / 其米德策耶（蒙古国）
- 174 仰慕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 康达维（美国）
- 200 我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朋友和崇拜者 / 马克林（澳大利亚）
- 224 我的中国（嗨）故事 / 弗拉蒂斯拉夫·巴亚茨（塞尔维亚）
- 244 我的中国故事 / 白罗米（罗马尼亚）
- 260 中国图书翻译之路 / 杜光民（缅甸）
- 268 感恩与挚爱 / 康斯坦丁·鲁博安（罗马尼亚）
- 288 我的三十年  
——怎样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的德译 / 高立希（德国）
- 306 与中国结缘 / 金胜一（韩国）

---

既然我的背景中没有任何东西促使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学习汉语？我对拉丁语和希腊语很是着迷，于是，我想学一种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现在依然活跃的语言和文化，最好这种文化尽可能远离欧洲传统。我曾考虑过梵文，但最终决定不学它，因为它和我熟悉的多数语言一样，属于印欧语系。我曾一度有过学习阿拉伯语的想法，但是，尽管《一千零一夜》很吸引人，我还是决定放弃，因为中东文化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不过是另一种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的一神教。这样，就剩下汉语这个选项了。汉文化既古老又鲜活，它的语言不属于我知道的任何语系，它的非字母文字也增添了吸引力。后来我才认识到，很明显，我的选择是基于极大的无知，但在十八岁这个年纪，不可动摇的自信弥补了这种无知。

——伊维德（荷兰）

伊维德，荷兰翻译家、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致力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国戏剧和中国女性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译著有荷兰文版《孟浩然文选》《李清照文选》《西厢记》等。



## 中国文学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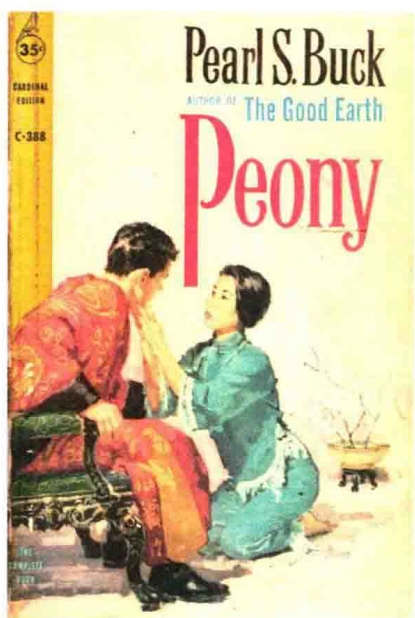
伊维德（荷兰）

在我的家庭背景或少年时代的经历中，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我最终会从事汉学研究。我出生于1944年，成长于冷战时期，在荷兰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父亲是当地一家合作乳制品加工厂的厂长。我的祖父母双方世代都是农民，与中国贸易或亚洲文化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家族中，除了一位学医的表兄，没有人上过大学。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对米卡诺（一种组装玩具，可以组装成各种运动的物体）非常着迷，于是父母认为，我长大后一定会成为工程师，并希望我最终进入一所高级技工学校。等我上了高中，很快发现，我对汽车、摩托车的内燃机及其实际应用没有一点感觉，对收音机、留声机、录音机或电视等电子设备更是毫无兴趣。不过，我肯定是有一些语言天赋，因为我喜欢学习外语。在选择学校时，我决定上六年制的高中（文科中学），教授的课程除英语外，还包括法语和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最后两年还提供希伯来语选修课）。我一直非常喜欢这些语言类课程，而我自己阅读的内容，均远远超出课程要求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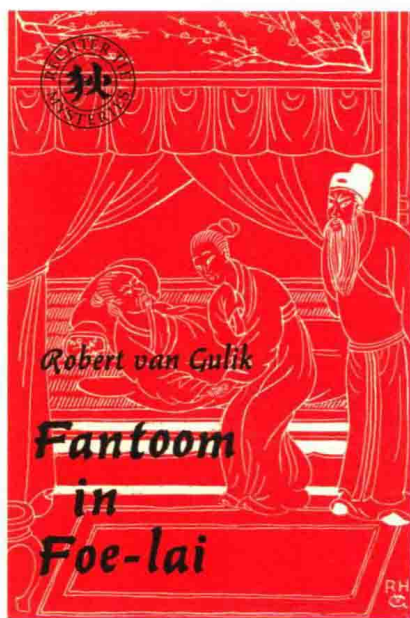
我大学时选择汉语语言与文化作为专业，或许与遗传有着某种关系，因为我的父亲高中毕业时曾想当一个飞行员，随着工作周游世界。当对这个梦想的追求被他的父母阻止时，他就许下诺言，将来允许自己的孩子选择想学习的课程和想从事的职业。虽然他从未想到过有一个孩子会学习汉语，但是，当我宣布了自己的选择时，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现在，在欧洲，每年有数千名大学生学习汉语，许多高中也教授汉语，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很少有学生被这门课吸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荷兰汉语专业毕业学生可以指望被委派到远东事务办公室设在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群岛殖民管理当局工作，这个职位在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就被取消了。当时荷兰与中国的联系非常有限，1963年初，我来到莱顿大学询问学习汉语的可能性，我后来的老师告诉我，毕业后的工作机会，就算不是完全没有，也是极其有限。但是，当作为新生进入大学时，毕业的日子还藏在遥远的未来，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荷兰到处都是就业机会，我从未担心过自己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我的同学们也是如此。

既然我的背景中没有任何东西促使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学习汉语？我对拉丁语和希腊语很是着迷，于是，我想学一种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现在依然活跃的语言和文化，最好这种文化尽可能远离欧洲传统。我曾考虑过梵文，但最终决定不学它，因为它和我熟悉的多数语言一样，属于印欧语系。我曾一度有过学习阿拉伯语的想法，但是，尽管《一千零一夜》很吸引人，我还是决定放弃，因为中东文化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不过是另一种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的一神教。这样，就剩下汉语这个选项了。汉文化既古老又鲜活，它的语言不属于我知道的任何语系，它的非字母文字也增添了吸引力。后来我才认识到，很明显，我的选择是基于极大的无知，但在十八岁这个年纪，不可动摇的自信弥补了这种无知。

当我离开家乡的小村庄，来到莱顿，入学成为一名汉语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时，对中国了解多少？我不得不承认，少之又少。我读过的第一本英文原版小说，是赛珍珠（1892—1973）写的《牡丹》（*Peony*），是在我



英语版 赛珍珠作品《牡丹》



荷兰语版 高罗佩作品《大唐狄公案》

上高中的小镇书店里买的简装书。《牡丹》并不是赛珍珠最著名的作品，但内容很有趣。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封最后的犹太家庭。这家人的儿子从外表看完全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在日本人持续蚕食中国领土时，充满爱国热情，最后加入新成立的中国空军。这时，他爱上了家里的女仆牡丹。对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思想传统的父母大为恼火。但是，当儿子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牡丹怀孕，特别是在牡丹生下能延续香火的男孩之后，他们最终接纳了她。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赛珍珠在《牡丹》中描写的私情，源自巴金（1904—2005）的《家》（*Family*）。

我读过的关于中国的另一本书，是当时能找到的罗伯特·H. 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 1910—1967）写的小说《大唐狄公案》（*Judge Dee*）的荷兰语译本。高罗佩是荷兰汉学家和外交官，但他的小说《大唐狄公案》是用英语写的，在荷兰以外的国度畅销后才开始出现荷兰语译本。我的父亲也是《大唐狄公案》的忠实读者，我周五晚上从村里的公共图书

馆借来这些书，必须保证在周六下午父亲的周末开始之前读完。父亲最终收集到一整套荷兰语的《大唐狄公案》，后来被我继承下来。从上述情况应该很清楚地看到，我上大学前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但随着进入大学，我发现，这种知识的欠缺也有好处。我的一些同学直言不讳地表示，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某个方面兴趣浓厚而学习汉语，却难以接受学习语言需要花费的时间（以至于几乎全部都转到其他专业），但我却可以全心投入语言学习，没有这样的困惑。我一直喜欢学习语言，并且非常高兴地了解到，在莱顿，鉴于日本汉学奖学金的数量和质量，我们还将熟悉日语。

## 在莱顿大学学习汉语

1963年9月，我开始在莱顿学习，直到1968年3月获得 *doctoraal examen* 文凭（大概相当于文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我最重要的老师是何四维（Anthony Hulswé，1910—1993）、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和迪尔克·约恩克（Dirk Jonker，1925—1973）。何四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接受过荷属东印度群岛事务的培训，在他到达巴达维亚加入远东事务办公室后不久，荷属东印度群岛即被日本占领，他在一个日本集中营里被扣押了三年。二战后，他很快来到莱顿大学，担任现代汉语讲师。不过，他的研究重点是两千多年前汉代的法律和制度。我上大学一年级那年，他教现代汉语语法课，后来，我又跟他上了《汉书》阅读和汉代史的相关课程。那些年，他在翻译关于西域的章节，我们阅读的就是那一章——不仅阅读正文，还包括清代考据大家写的大量注释。这些课程的内容经常是很枯燥的，但我还是非常感激这种汉语注释阅读对我的磨练。何四维是我们了解战前为殖民管理服务的传统汉学最后的联结者，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研究工作的许理和，在许多方面代表着二十世纪下半叶荷兰汉学研究的面貌。许理和的声望是从他的博士论文《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开始确立的，论文讨论的是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接收并转化了印度佛教。他被任命为东亚史教授，特别关注东方与西方文化

碰撞方面的研究，早期还投入多年时间，研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收与转化（关于这一课题，他发表的论文很少），之后，他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明代后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布道团，以及十七世纪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收与转化（关于这一课题，他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在该领域培养了多位博士生）。迪尔克·约恩克在我入学时是汉学院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管理员，同时担任我们的文言文入门课程的教师。他还是唯一一位对中国诗歌感兴趣的人。他选择一生写过万余首诗词的宋代词人陆游（1125—1210）的作品作为（未完成的论文的）主题。给我们上日语课的是日韩语言与文化教授弗里茨·福斯（Frits Vos, 1918—2000）。在那些年，日语专业的学生比汉语专业还少。1963年我到莱顿时，只有一位新生在学习日语。

在学生时代，我对社会学和文学同样感兴趣。选择选修课时，我选的第一门课就是文化人类学与发展社会学。我对社会学的兴趣，是被有关中国农业表现的积极报道激发起来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饥荒和灾害的新闻经常令人沮丧），我的兴趣尤其集中在农村的发展。我认为，要理解农村的发展，还需要了解农业，就选热带农业作为第二门选修课。为了上这门课，我得去瓦赫宁根，因为那里有荷兰唯一一所农业大学。莱顿和瓦赫宁根之间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为了听一两节课，我要在路上花几个小时。并且，我必须承认，那些课程极其枯燥。一个冬天，我出门晚了，冲下楼梯，指望着还能赶上火车，街上都是冰，我出门的时候滑倒了，摔了个四脚朝天。我仰面朝天躺在那里，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当即决定放弃这门课。社会学课程和戈特弗里德·洛克（Gottfried Locher, 1908—1997）留的阅读作业则让我获益良多。洛克在二战前曾与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到帝汶岛进行人类学的实地考察工作。他有广泛的学术好奇心，让我订阅《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保持对荷兰以外学术发展的接触，我一直非常珍视这条建议。在1967年，想去中国进行社会学实地考察，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些年，社会人类学与发展社会学系的学生会被带到我家所在的德伦特省进行实地实习，所以，为了感受文化冲击，我被打发回

家乡的小村，待在父母身边。

对于中国文学，我学生时代的兴趣集中在明清白话小说。十九世纪汉学家对中国的小说和短篇小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这是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窗口。到二十世纪初，欧洲的汉学研究离开了这一课题，在清代伟大学者的引领下，主要对古典文学和哲学家进行研究，而此时，恰逢中国学者将传统白话文纳入中国文学的研究范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一领域，美洲和欧洲学者只是在一味追赶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研究。至于现代和当代小说，除了东欧学者外，我老师的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任何研究。因此，在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眼里，传统白话小说是中国研究一个全新而令人兴奋的领域。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话本，不仅包括冯梦龙（1574—1645）整理的大量著作，还有这些作品的一些早期版本，探究冯梦龙是如何对这些早期材料进行改写，使之符合自己的写作目标。

我接受的训练，一部分是正规课程，但我还从学生助理的工作中学到了许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汉学院的中国资料中心担任图书馆助理。我开始在中文图书馆工作时，迪尔克·约恩克还是图书管理员，但他的工作很快被威廉·阿克（William Acker, 1907—1974）接替，阿克是一位身材高大，走路迟缓，性格极其温和的人。我的工作是将新收到的图书拆开包装，进行编目。那个时候，莱顿使用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图书分类法。我知识有限，又缺乏经验，一定编错过许多书名。此后的日子里，部分卡片目录还在使用，我总会偶尔遇到自己早年书写的图书卡片。我的工作不太忙，这让我有大量机会，爬到书架上层，浏览藏书。后来我放弃了这份在书的海洋里畅游的轻松工作，成为社会人类学与发展社会学系的教师助理，有时会被要求上一节通识课程中有关中国的课。我的另一段重要的成长经历是一年一度的青年汉学大会。这项为期一周的活动，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剑桥大学和莱顿大学国际硕士课程演变而来，每年由欧洲不同的中国研究中心组织。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资深教师参加，但活动仍向各年级的学生开放。在莱顿，校方鼓励我们参加这项活动，提供旅行补助，这些费用最终由庚子赔款支付。我还是大一新生时参加的第一次青年汉学大会，在

波尔多举办，后来参加的两次在利兹和哥本哈根郊区举办。活动非常精彩，展现了汉学研究的国际性质，让充满敬畏的学生能够看到这一领域资深学者的思想碰撞。

## 海外学习与事业起步

1968年，我拿到 *doctoraal examen* 文凭时，已能阅读相当多的中文，但几乎不会说一句汉语，我想是时候去中国了。1950年初，虽然荷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当时两国的外交关系处于低谷，即使有交换生协议也没有什么用，因为那时中国所有大学都是对外封闭的。我当然可以选择去台湾地区，但荷兰大学和台湾大学也没有交换关系，我的老师也不鼓励我去那里——相反，他们（私下里）笑话那些愚蠢的美国人，去前日本殖民地去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但荷兰与日本却的确有一个交换协议：每年可以有一名荷兰学生去日本，享受为期两年的奖学金。1968年，有一名日语学生获得这个奖学金的资格，但他的女朋友告诉他，如果他离开这么久，他们的关系就结束，所以他拒绝了申请。我是单身，不能失去这个好机会：于是我申请并通过测试，在当年3月底飞到日本，以便赶上4月1日开始的新学年。因为我想去一所位于讲标准日语的地区，而且外国学生较少的好学校，这样才能被迫说日语，于是我选择了札幌的北海道大学，选修了农村社会学专业。我的日语口语显然被认为是够用的，到东京几天后，就被送上开往北海道的火车。

在适应札幌生活的同时，我决定每天读几章中国传统小说，读我能拿到的任何小说，以免失去阅读能力。我在札幌的一年里，读了大量各类作品，许多都属于中国文学史的范畴，因为那段时间学校在教那些课，但不管怎么说，都非常有趣。后来的若干年，我都保持着每天阅读几章中国传统小说的习惯。这些关于战争与宫廷斗争、忠诚与谋反、爱情与背叛的故事，展示了与古典哲学读本或正史非常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图景。阅读过程

中，我经常（当然并不总是）一章一章整理简单的摘要，并记下我喜欢的方面。虽然我在札幌的学术导师对我非常好，带我和他们一起开展实地工作，但却并没有激发出我对社会调查的强烈热情，而且因为阅读，我对文学的热爱有增无减，于是申请转学，并于1969年4月转学到京都大学。然而，我在日本那两年，日本青年一方面受到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片面信息的鼓动，一方面被强烈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延期的情绪点燃，爆发了激烈的反抗行为，日本大学也受到学生暴乱的冲击。1969年1月我前往京都大学拜访时，那里的教师似乎非常高兴，虽然他们学校和东京大学一样有自己的学生运动。到4月报到时，他们就不那么高兴了。校园的学术生活完全停顿，因为学生各派互相争斗，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整个1969—1970学年均无法上课，图书馆也关闭了。

“有其利必有其弊”，这是荷兰足球传奇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yff）说过的至理名言。由于大学关门，我流落到人文科学研究所（Jimbun kagaku kenkyujo）。那里的常规研究和阅读小组也取消了活动，但至少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开放。似乎我是图书馆为数不多的读者之一，工作人员总是非常热情地帮我找到需要的资料。现在，各大学都极力精简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迫使学生尽快完成课业。多年来，我已积累了足够的行政经验，理解其背后的理由，但仍会愉快地回想起在日本的那两年：没有明确的研究计划，只是广泛地阅读。只要对某个课题感兴趣，我就会追随这种兴趣，连续一周或一个月，然后转到下一个课题，就像一个贪婪又浮躁的杂食动物。在研究所，我遇到了田中谦二（Tanaka Kenji, 1912—2002），早期中国白话文领域的杰出学者。作为青木正儿（Aoki Masaru, 1887—1964）的学生，他曾与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 1904—1980）和入谷义高（Iriya Yoshitaka, 1910—1998）合作研究元代戏曲。后来田中曾发表过关于诸宫调和散曲的论文。他心地善良，非常同情我和几位外国同学的处境，在那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决定组织一个元代戏曲阅读小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文原文的杂剧。我们在这个小组会中慢慢啃下的剧本是《杀狗劝夫》，

这并不是此类大师的主要作品，但它是一部非常生动的喜剧，舞台表演一定非常成功，因此，特别适合向初学者介绍。对我来说，它至少激发了我对元代戏曲的热爱，并使我适时地将兴趣扩大到传统戏曲和表演文学的其他门类。在小组会上，我们使用吉川、入谷和田中他们研究整理的元代戏曲资料的注释版本。在课上，田中痛惜的是，虽然注释都是用中文写就的，但这些版本在中国却找不到读者。

我在日本的学业即将结束时，收到来自荷兰的两份工作邀请。一份来自社会人类学与发展社会学系，暗示我在适当的时候能发表关于苏里南中国人社区的社会志。另一份来自汉学院，1969年，由许理和发起成立了当代中国资料中心。我决定接受第二份邀请，因为这份工作能让我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本身，他还保证，我能够拿到奖学金。那个夏天我待在香港，在联合研究所进行研究。我不在荷兰的时候，汉学院为努力提高现代汉语的



青年时期的伊维德先生